



JESL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in Literature

JESL, Vol. 1, No. 1, 2026, pp.82-91.

Print ISSN: 3107-3492; Online ISSN: 3107-35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esl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esl260105pwcbg>



从《周六晚与周日晨》看英国“黄金时代”的工人阶级困境

李郑心岚 (Li Zhengxinlan), 李 锋 (Li Feng)

摘要：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影响，二战后的英国通过国有化改革推动工业经济复苏，带动工业城市蓬勃发展，促成消费社会兴起，迎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阿兰·西利托的小说《周六晚与周日晨》以 20 世纪五十年代工人的生存境遇为切入点，揭露了繁荣表象下被掩盖的劳动规训、劳资博弈，以及消费主义蔓延等社会问题。流水线生产、薪酬体系与工作纪律将工人异化为可替代的工具，工人则以消极怠工、反抗权威等方式进行抗争，工厂内部形成对立割裂的等级关系，劳资矛盾不断激化。在工厂之外，战争创伤、核威胁等现代化风险笼罩英国社会，工人们试图通过报复性消费、纵情享乐来逃避生存焦虑，分期付款、超前消费等信贷消费模式也逐渐流行。规训与诱惑相互交织，最终使工人陷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异化。

关键词：《周六晚与周日晨》；黄金时代；工人阶级；劳动规训；消费社会

作者介绍：李郑心岚，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电子邮箱：lizhengxinlan@stu.ouc.edu.cn。李锋（通讯作者），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电子邮箱：franklee1978@163.com。

Title: The Plight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s "Golden Age": A Case Study of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ought, post-WWII

Britain restored its industrial economy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reforms. These policies boosted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ties, facilitated the rise of a consumer society, and ushered in a golden age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lan Sillitoe's novel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focuses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orkers in the 1950s, exposing social problems hidden behind prosperity—including labor disciplin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the spread of consumerism. Driven by assembly-line production, wage systems and work disciplines, workers were reduced to replaceable tools, yet they resisted through acts like slacking and defying authority. Such conditions engendered antagonistic and fragmented hierarchies inside factories and further intensified conflict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Outside the workplace, British society was overshadowed by modernization risks such as wartime trauma and nuclear threats. To escape existential anxiety, workers resorted to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and hedonistic pleasures, leading to the growing prevalence of credit-based consumption such as installments and advanced consumption. As discipline and temptation became intertwined, workers were ultimately trapped in a stat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alienation.

Keywords: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Golden age; Working class; Labor discipline; Consumer society

Author Biography: Li Zhengxinlan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lizhengxinlan@stu.ouc.edu.cn. Li F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of English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franklee1978@163.com.

1950–1973 年的二十余年间，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的经济快速复苏，这一时期被学界称为欧洲经济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Crafts, 2018, p. 79）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指导下，战后的英国政府开始推行国有化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与充分就业政策，国内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民众消费能力持续增强。1957 年 7 月，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贝德福德发表著名演讲，称英国民众正经历“生活从未如此美好”（Never Having Had it So Good）的时代，这句乐观宣言旋即成为战后经济繁荣期的政治标语。（Thorpe, 2010, p. 62）

然而，在主流话语所歌颂的繁荣背后，广大底层工人的真实处境与生活体验却长期被遮蔽。作为“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代表作家，阿兰·西利托（Alan Sillitoe, 1928-2010）从工人视角出发，撕开了这层光鲜表象。他出生于英国诺丁汉一个工人家庭，曾在自行车厂务工，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对英国工人的生活有着深刻认知。1958 年，西利托的首部小说《周六晚与周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1958）甫一问世即大获成功，被誉为“阶级意识的核心，散发着工人阶级精神的光晕”。（Ritchie, 1988,

p. 199) 小说以青年工人亚瑟·西顿 (Arthur Seaton) 的工作与生活为叙事中心, 详实地展现了战后英国的社会与经济面貌, 在宏观层面勾勒出黄金时代工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工厂内部的运行逻辑, 以及消费社会逐步形成与扩张的整体局势。同时, 西利托巧妙地将工业经济结构、工厂运营模式与工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心理变化联系起来, 从微观视角呈现工人在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处境, 进而反映出工人阶级在时代发展中的生存焦虑与困境。

一、黄金时代的工业图景：工业经济、城市与消费社会

二战后, 英国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 通过国家干预推动战后经济重建与工业复苏。政府先后通过八个国有化法令, 将英格兰银行、煤矿、航空、电报和无线电通讯等关键机构与基础行业收归国有。国家的统一管理有效稳定了生产秩序、加速了产能恢复, 进而促进工业与制造业发展。英国延续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根基, 形成以钢铁、机械、汽车、纺织等为核心的制造业体系, 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 20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维持在 40%左右^①, 失业率长期处于 1%-2% 的低位。(Denman & McDonald, 1996, p. 7) 发达的工业经济推动国民收入快速增长, 涌现出“一批实现充分就业、收入持续提升且权益不断完善的劳动力群体, 不仅享有持续增长的工资与附加福利, 还受益于不断扩展且更为完善的福利政策”(Hobsbawm, 1995, p. 282)。《周六晚与周日晨》的故事背景正是设定在战后工业蒸蒸日上的五十年代初期, 主人公亚瑟是自行车工厂的车床工人, 他工作稳定、温饱无虞, 能负担得起酒水、香烟等非必需品, 也不必为失业或贫困忧心。从收入水平来看, 他的周薪为 14 英镑, 在当时英国人周均工资为 7.14 英镑的年代^②, 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以看出, 战后蓬勃兴起的工业经济为工人们带来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 提升了整体的生活质量与消费水平。

工业的繁荣也不断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 伯明翰、曼彻斯特、诺丁汉等工业城市迅速发展。其中诺丁汉作为英格兰中部的重要工业城市, 其制药、烟草、纺织等本土产业在黄金时代十分兴盛, 吸纳了大量本地及周边劳动力, 单是一家自行车公司便有 7000 余名员工。

(Williams, 2022, p. 2) 这类工业城市的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均围绕工业生产展开, 工厂逐渐成为城市空间的核心组成部分。工业生产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融合, 还对工人的家庭结构与居住空间产生影响——传统的联合家庭逐渐向讲求效率的夫妇式家庭 (conjugal family) 与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转变。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古德 (William Goode) 指出: “夫妇式家庭比其他任何家庭形式都更能适应工业化制度的需要。个人更容易顺应劳动市场的需要, 更能集中精力干工作, 而不是集中精力考虑其亲戚网络的需要。”(古德, 1986, p. 156) 小说中, 亚瑟一家与其他工人家庭通常采用新居制, 由一对夫妻独立门户, 丈夫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进厂务工, 妻子承担家务劳动, 而年龄稍长的子女或在本地工厂工作, 或

^①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ong-term trends in UK employment: 1861 to 2018.”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uksectoraccounts/compendium/economicreview/april2019/longtermtrendsinukemployment1861to2018#the-evolution-of-sectoral-distribution-of-employment>.

^② Bank of England. “A Millennium of Macroeconomic Data.”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statistics/research-datasets>.

前往其他城市谋生。与此同时，适配核心家庭 4-5 人居住、兼具低成本、高灵活性的“两上两下”（two-up, two-down）住宅成为主流。这类住宅多建于城市郊区的工厂周边，既满足工人家庭的居住需求，又契合工业城市低成本扩张的逻辑，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推行。

在工业经济稳定发展、工人收入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撑下，个人与集体的消费需求持续扩大，英国也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消费社会。1961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当代与未来住宅》（*Homes for Today and Tomorrow*）报告显示：每日有“近一千户家庭迁入新房，每三户家庭中便有一户拥有汽车，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电视机”。（Burnett, 1986, pp. 304-306）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1998）中揭露当代发达社会已从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个体的身份定义从“我生产了什么”转向“我消费了什么”。（鲍曼，2021，p. 29）在这个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鲍曼，2021，p. 29）也就是说，消费不仅是满足需求的行为，更是寻求自我认同、稳固社会地位的手段——“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鲍曼，2021，pp. 32-33）

亚瑟一家在战前依赖救济金生活在贫民窟，战后则拥有四居室的住房和电视机。这台电视机不再仅仅是娱乐工具，更成了亚瑟一家脱离赤贫、成为体面消费者的象征。当亚瑟在工厂里以计件劳动换取工资，又将这笔收入用于购置香烟、酒水与其他家庭消费时，他的身份已从作为生产者的车工转变为具有购买意愿和能力的消费者。这种意愿和能力是消费社会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否则个人将承担“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污名和耻辱”。（鲍曼，2021，p. 52）四居室烟囱上安装的电视天线共同构成了亚瑟一家向外界证明生活变好的物质凭证。以消费定义生活的逻辑还延伸到了日常娱乐领域——随着当代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的娱乐活动与消遣方式也因消费主义的渗透变得日益多样化。西利托笔下的工人们在酒吧、赛会、俱乐部、跑马场、鹅市等娱乐场所肆意狂欢，是经济繁荣下消费社会狂欢的缩影。

战后的黄金时代为英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依托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与国家干预构建的国有化工业体系，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工人们的就业得到了保障，工业城市的家庭结构与居住空间发生转变，住宅、家电、服饰、娱乐等消费项目构建起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值得注意的是，黄金时代虽为工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同样为后续劳资博弈、阶级对立、消费主义盛行等社会矛盾埋下伏笔。正是繁荣与隐忧的交织，让黄金时代成为英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其塑造的阶级关系、生产与生活方式对战后英国的社会与经济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繁荣背后的剥削：劳动规训与劳资博弈

黄金时代的经济复苏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常常被视作资本主义进步的明证，但细究之下便会发现，繁荣背后的剥削并未因经济的表面景气而消解；相反，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变得更为系统化、结构化。在工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中，工厂作为劳动规训与阶级对抗的核心场所，通过生产模式、物理环境、薪资制度和纪律对工人的身体与精神实施

直接剥削。自 1913 年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开创车间流水线生产模式以来，工厂逐渐迈入大规模流水线的工业化生产时代。这种模式将整个劳动过程分解为标准化的步骤，彻底改变了工人们的劳动状态，使他们的主体性被简化为流水线上的可替换零件。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 1991, p. 175）提出，常规生产行业的从业者（如流水线车工、领班、蓝领工人等非技术性操作者）被固定在单一的工序上，重复执行特定步骤，“他们与其他同事一起在大型封闭空间内工作……主要优点是可靠性、忠诚和服从指挥的能力”。流水线分工虽然提升了生产效率，却导致工人技能的单一化，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作为一名流水线工人，亚瑟的全部工作就是一遍遍地拧紧螺丝。这种被异化为机器的工作状态，甚至影响到亚瑟对生命和时间的认知。对他而言，未来不过是“对当下的机械复演，时间的流逝不过是季节与事物的循环往复”（Bell, 2000, p. 159）。

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空间同样受到了压迫。工厂车间乃至生活社区里到处充斥着噪音与油污，“发电机通宵达旦地轰鸣着……工厂周围四间一套的住房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杀菌剂泡沫、油污和新切割的钢屑”^①。持续的环境侵蚀不仅损害工人的身体健康，更在无形中消磨他们的反抗意志。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也让工人无暇顾及自我成长，“休闲时间的缺乏……剥夺了他们发展智力的机会，导致其认知水平低下。”（李锋，2024, p. 81）以亚瑟为代表的工人，其受教育程度十分匮乏，他们大多数都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就辍学进厂，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车间工作。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全然被工厂所主导，以至于书名中的“周六晚”与“周日晨”这两处时间节点，唯有置于“与这份工作的辩证关系中才能被理解”。（Del Valle Alcalá, 2016, p. 14）这是因为，对于一名底层工人来说，一个星期里仅有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才是无拘无束、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工作、难缠的工头，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亚瑟将周一称为“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因为在这一天，周末的富裕和快乐仿若幻影，取而代之的则是即将到来的残酷现实。

在周而复始的剥削循环中，工资不仅模糊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界限，还将劳动“简化为可量化的时间，试图由此消解工人的主体性”（Del Valle Alcalá, 2016, p. 27）。在这种以时间为标准的工资计量方式下，工人的价值认知完全围绕工资展开：他们重视发薪日，认为周五发薪是吉利的象征，还会在当天获得特别加餐。工资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报酬属性，逐渐演变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尺。亚瑟的工资和劳动价值在书中被刻意地反复提及；在介绍其他工人时，他们的工钱亦如个人名片般频繁出现。这些都是工人主体性被弱化、生活完全服从于工资逻辑的具体体现。此外，黄金时代的英国工厂普遍实施“差别计件制”的刺激性付酬制度，即“按照工人是否完成其定额而采取不同的工资率”（泰勒，2013, p. 249）。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提出这一薪资制度的初心是激发工人劳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许多工厂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故意实施不透明工资并垄断定额标准，以便“驱赶工人们去更艰苦、更勤劳地工作，却不增加多少工资”（泰勒，2013, p. 76）。这也让工资沦为挑拨工人关系、煽动恶

^① 阿兰·西利托（2004）：《周六晚与周日晨》，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p. 20。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意竞争的手段。工头罗波（Robboe）曾对亚瑟说：“我没有说钱不是你挣的，可你最好别张扬。我不愿意谁知道你拿回家多少钱。他们全都会抓住我的喉咙，要求加工资的。”（p. 54）

压榨工人薪资的行为，还延伸到了社会政策的设计与运行中。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极端贫困，但部分名义上与“福利”挂钩的保险、税务等项目，实际并未真正惠及人民百姓，反而以苛捐杂税的形式将经济负担转嫁给他们。亚瑟直接撕开了福利政策的假面：“‘领瘦’们每周都要从我们的工资袋里挖保险费呀所得税呀什么的，而且打算告诉我们那全都是为了我们好。”（28）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福利政策变成了工资单上被扣减的高额税款，将底层劳动者本就微薄的工资进一步挖空。以福利为名的持续压榨，催生出更为尖锐的矛盾。

工人们虽有稳定收入，却在社会管理中缺少话语权，自身地位也未得到充分认可。这种落差正是他们对现状心生愤怒与不满的根源，更是导致亚瑟心理状态自相矛盾的主因——他时而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p. 31），时而想要“把国会卖掉，把工厂炸掉”（p. 29）。产生这种矛盾心态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承认战后相对富裕的经济条件离不开国家、政府等当权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始终以体制外者自居，将自发性的暴力反抗视为挑战权威和制度的方法。”（Kalliney, 2001, p. 107）对于像亚瑟这样愤怒的青年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对抗扭曲、矛盾的现实，正因“错误投生到了一个疯狂离奇的世界”，他便只能“每天战斗，直到死亡”（p. 213）。

在此背景下，工人们的一切当权者的怨恨与仇视被不断放大。谩骂政府、诋毁当权者成了他们缓解失衡感的出口，叛逆行为也被赋予了“向生存困境与权力压迫宣泄不满和抗议”的道德正当性。（Wilson, 2006, p. 112）他们自发地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工党”，把凡是不反对政府、同工厂站在一起的人视为叛徒（p. 9）。工头、监工等人更是被形容为敌人的侦察兵，他们象征着工厂内部的“阶级壁垒”以及“最惹人厌憎的一切特质”。（Lewis, 1978, p. 161）正是这种藏在血脉里的阶级仇视与对立，让亚瑟多次站出来号召工人们反对压迫：“别叫混蛋们折磨垮了。”（p. 33）这种反抗首先体现在对工作的消极态度与抵制行为上。尽管工人们自身的工作条件几乎毫无掌控力，但在决定工作速度方面却拥有一定自主权：只要上午完成定额、赚够当天的钱，亚瑟下午便能慢悠悠地干活，就可以“磨洋工，跟女人开开玩笑，跟伙伴吹吹牛了”（p. 24）。为了对抗流水线的乏味枯燥，他上班时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幻想中，“只要胡思乱想，时间就一小时一小时迅速消失”（p. 26）。这些看似荒唐甚至幼稚的举动，其实都是工人对抗阶级壁垒、宣泄对当权者不满的方式——通过消极怠工、故意复杂化操作、做白日梦等策略，他们反抗自己在技术层面从属于机器的状态，将自主安排工作速度的权力，变成抵抗流水线压迫的重要工具。

然而，与传统的集体阶级斗争相比，诺丁汉工人们的叛逆与愤怒本质上是“一场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反叛”（Wiemann, 2017, p. 115），这种抗争精神只能依靠消极工作、酗酒狂欢、语言暴力等方式来彰显。他们仇视一切有权阶级，跟工头、警察和政府对着干，将叛逆的个性与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作为逃避现实、投身于温柔乡的挡箭牌。纵使对工作、金钱、制度有所抱怨，亚瑟式的愤青们也并不完全是革命者；相反，他们只是被成功的门

槛拒之门外，拼命想要获得“名望、美女和财富”的年轻人罢了。（Morris, 2009, pp. 161&165）工人们的愤怒与反抗更多源于“继承、盲从而非反思”（Bell, 2000, p. 152），这种心理状态也揭示了其阶级意识觉醒的模糊性——与18世纪末暴力革命的激昂和决心相反，书中工人们的斗争“太轻率，太没有组织，非失败不可”（p. 174）；在工厂以外，面对更加隐形、充满诱惑的消费社会，欲望在无形之中瓦解了工人们的愤懑与敌意，使其在物质的享乐中彻底缴械投降。

三、消费享乐的狂欢：风险社会与信贷经济

工厂内的直接压迫催生了工人们零散而无力的反抗，而当战场从车间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及消费领域，资本家的操控手段便随之升级：“资本主义在试图掌控工人阶级自主性方面，已达到了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水平。”（Del Valle Alcalá, 2016, p. 17）当社会秩序从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时，个体的价值标准、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都会被彻底重构。在小说中，平淡稳定的生活和其他传统价值观对于亚瑟而言皆如浮云，只有购买漂亮、昂贵的服饰才能彰显他的财富与生命的价值，“他对自己说，在衣服上花钱是聪明的投资，因为它们使他漂亮，也使他快活”（59）。购物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补偿。车工这份工作仅能勉强维系亚瑟的基本生计，他无法在岗位上凭借专业技能获得自豪感与成就感，便只能通过购买精美商品来寻求——“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鲍曼, 2021, p. 89）

这种被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二战后，对战争的恐惧依然萦绕在大众心中，整日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导致大家都倾向于过及时行乐的生活，“因为一年一年地存钱是没有用的，那是傻瓜才玩的游戏。钱一天天贬值，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美国佬什么时候会干出疯狂的事，往莫斯科扔下个氢弹什么的”（p. 21）。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战争与核事故等现代化风险对人类的威胁具有全局性，“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者，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贝克, 2018, p. 7）在现代化风险的阴影下，共同体的性质由追求平等转向规避危险，即“共同的焦虑取代了共同的需求”。（贝克, 2018, p. 48）与此同时，大众对风险、焦虑、不安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以及人生层面的选择——对于“日常意识既看不到也感知不到的内容的现实意涵，如放射性物质、污染物和未来的威胁”（贝克, 2018, p. 82），公众会感受到恐惧、痛苦以及被威胁感，最终凝结成普遍的受害意识。亚瑟感到“全世界就没有一片可以称作安全的土地……你在黑森林中的洞穴里住，觉得不安全，极不安全，就只好永远睁着一只眼睡觉，身边放一大堆伸手就能抓到的尖石头”（p. 176）。对于极度焦虑的人，唯有落在实处的物品和及时享受的生活，才能像“尖石头”一样给予片刻安慰。因此，周六晚的报复性消费既是对现实风险的规避，对生存焦虑的逃避，也是工人们缓解不安与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

因为那是周六晚，一周之中最快活、最宜于饮酒喧哗的日子，是随着年月的大轮子缓慢运转的五十二个假日之一，是筋疲力尽的安息日的暴烈前奏。积蓄了整整一个礼拜

的情绪在周六晚上爆发，工厂里整个礼拜枯燥苦役的后果随着祝福的喊叫从你全身上下往外喷射。(p. 3)

面对未知和不可见的风险，狂欢成为工人们克服恐惧的方式。他们习惯了透支工资、提前消费、四处欠账，只为把全部积蓄花个精光，害怕突然爆发的战争将随时终结一切生活。同样地，流水线车工这一职业深刻影响着工人消费观和心态——劳动者的工作是脆弱的、临时的、可替换的，因此他们很少有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的意愿，亦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久而久之，这些工人的人生观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鲍曼，2021，p. 87) 现代化风险带来的生存焦虑瓦解了工人对未来的信心，低技能、高替代性的工作则消磨了他们的抗争动力，于是他们放弃对长期规划的追求，转通过即时消费获取短期快感，以应对未知风险与乏味工作带来的焦虑感。

工人对风险的感知与生活观念的转变，使得节俭储蓄、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模式逐渐式微，而分期付款、赊账、及时享乐的炫耀性消费则变得流行起来。事实上，后者的兴起并非偶然，自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小规模信贷经济开始在英国萌芽，一些店铺与家庭超市主要针对食品、日用品、衣物等工人家庭的主要支出项目，推出一种类似于租购的分期付款模式(即 *never-never*)。(Johnson, 1985, p. 145) 到 20 世纪中期，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放宽信贷管制，银行与大型商超进一步合作普及分期付款制度，让普通工人家庭得以购买过去难以负担的商品。在小说中，分期付款的商品随处可见，亚瑟家的电视机需要每周还款 30 先令，其他工人家庭几乎每家每户“都装着电视天线，仿佛成了雷达站——全都是靠分期付款安装的”；亚瑟对此打趣道，只需每周付款五先令，每个人都能有一架小型直升机(p. 22)。支撑这种狂热消费的，正是资本主义对消费意义与价值的扭曲，即大众被灌输“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鲍曼，2021，p. 109) 从表面上看，分期付款暂时提升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提前满足了物质欲望；然而在超前消费的经济压力下，工人们更难摆脱资本控制——发薪日的短暂狂欢之后，是接踵而至的负债与还款压力，从而形成一个难以挣脱的循环。

这种循环的背后，是消费主义与资本对人性欲望的深刻洞悉与把握。鲍曼认为，消费主义的核心就是不断地唤醒和满足某种欲望，“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

(鲍曼，2021，p. 109) 在钓鱼时，亚瑟顿悟到原来自己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共同打造鱼塘中，追求着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突然，泼拉一声！你的嘴叫大鱼钩钩住了，你给钓起来了。你还没明白自己在干着什么，你咬下的东西已超过了你能咬的限度，以后只好一辈子坚定地咬着同一块鱼饵。”(p. 211) 亚瑟将自己比作一条原本自由自在的鱼，消费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诱惑就是鱼饵，即使知晓咬上鱼饵就意味着死亡，他也情愿享受这一时的美味，这是因为“如果你一辈子老拒绝吞食摇晃在你面前的一切鱼饵，那就完全不称其为生活了。那就没有变化，你也没有斗争对象了。生活就会死气沉沉，像沟里的水一

样”(p. 211)。消费主义不断突破人类欲望的阈值,又迫使人们陷入持续消费的漩涡,因为在其逻辑中,人们一旦“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就会被消费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无论是否最终事关福祉”。(鲍曼,2021,p. 78)总之,周六晚的酒吧狂欢既是压抑情绪的释放与宣泄,又被纳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机械循环”。(Bell, 2000, p. 155)这也意味着,消费不再是真正自由的选择,反而成了被规训的狂欢仪式。

二战后英国黄金时代的经济繁荣,是凯恩斯主义、国有化改革与充分就业等政策共同推动的阶段性资本积累成果。当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剥削的本质便被表面的繁荣暂时遮蔽,但在表象之下,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系统性压迫始终在运转。流水线生产与科学管理持续加剧劳动异化,将工人困在机械重复的劳动中;差别计件的薪酬制度则以不透明的工资刻意分化工人间的团结;工厂内部的等级体系不断强化阶级间的敌视与对立。就连号称惠及大众的福利政策,也变为向劳动者转嫁经济负担的工具。西利托笔下的英国底层社会是黄金时代下的一道裂痕,它撕开了消费神话的伪装,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合谋打造的鱼塘:当工人以为自己通过消费成为生活的主人时,他们不过是从工资的奴隶变成了欲望的囚徒。在消费社会的规训下,他们用光鲜的服饰证明自我价值,用酗酒的狂欢规避未知风险,用超前消费的自由消解生存的压抑。在充满不确定性与威胁的风险社会里,享乐与狂欢趁虚而入,周六晚的啤酒成了人们对抗虚无、逃避现实的好办法。最终,劳动的异化与消费的异化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剥削工人价值、消解其反抗意志的闭环。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项目编号:22&ZD28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Funding: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British Literature” (22&ZD289)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 Zhengxinl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3228-9528>

Li Feng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5463-0620>

References

- 齐格蒙特·鲍曼(2021):《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Bauman, Zygmunt (2021).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translated by Guo Na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乌尔里希·贝克(2018):《风险社会》,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 [Beck, Ulrich (2018). *Risikogesellschaft*, translated by Zhang Wenjie, & He Bowen. Yilin Press.]

- Bell, Kathleen (2000). "Arthur Seaton and the Machine: A New Reading of Alan Sillitoe's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In H. Gustav Klaus, & Stephen Knight (Eds.), *British Industrial Fiction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48-162.
- Burnett, John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Housing 1815-1985*. Methuen.
- Crafts, Nicholas (2018). *Forging Ahead, Falling Behind and Fighting Ba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 Valle Alcalá, Roberto (2016). *British Working-Class Fiction: Narratives of Refusal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W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Denman, James and P. McDonald (1996).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From 1881 to The Present Day." *Labour Market Trends* (01): 5-18.
- 威廉·古德 (1986): 《家庭》, 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Goode, William (1986). *The Family*, translated by Wei Zhangl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 Hobsbawm, Eric (1995).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Abacus.
- Johnson, Paul (1985). *Saving and Spending: The Working-Class Economy in Britain, 1870-1939*. Clarendon Press.
- Kalliney, Peter (2001). "Cities of Affluence: Masculinity, Class, and the Angry Young Ma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01): 92-117.
- Lewis, Peter (1978). *The Fifties*. Book Club Associates.
- 李锋 (2024): "现代主义早期文学中的 '英国病'、国家干预理念与金融帝国构想", 《外国文学研究》(04): 74-85。
- [Li Feng (2024). "'British Disease', Ideas of State Intervention, and Imagination of Financial Empire in Early Modernist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4): 74-85.]
- Morris, John (2009). "Mid-Late Twentieth Century: 'An Unprecedented Moral Quagmire'." In Arthur Pollard (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siness in English Literature*. Liberty Fund, Inc.: 138-185.
- Reich, Robert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Simon & Schuster.
- Ritchie, Harry (1988). *Success Stories: Literature and the Media in England, 1950-1959*. Faber & Faber.
- 阿兰·西利托 (2004): 《周六晚与周日晨》, 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
- [Sillitoe, Alan (2004).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ranslated by Sun Fali. Yilin Press.]
- 弗雷德里克·泰勒 (2013): 《科学管理原理》, 赵涛, 陈瑞侠, 郭珊珊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 [Taylor, Frederick (2013).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translated by Zhao Tao, Chen Ruixia, & Guo Shanshan.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 Thorpe, D. R. (2010). "Harold Macmillan, 1957-1963." In Vernon Bogdanor (Ed.), *New Jerusalem to New Labour: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from Attlee to Blair*. Palgrave Macmillan UK: 60-78.
- Wiemann, Dirk (2017).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Reflections on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Novel." In Martin Middeke, Gabriele Rippl, & Hubert Zapf (Eds.),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Novel of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Vol. 5). Walter de Gruyter GmbH: 107-130.
- Williams, Philip Hamlyn (2022). *How Britain Shaped the Manufacturing World*. Pen & Sword History.
- Wilson, Colin (2006). *The Angry Yea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gry Young Men*. Robson Books.